



期刊·观察

# 第一个“世界非遗”版春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岁底的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决定,中国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去年同月,“春节”已先期成为联合国假日。

春节,不仅仅是中国的节日,更是世界的节日。据《南方周末》不完全统计,当前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20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文化盛事。这也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我们能过上第一个“世界非遗”版春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公布的相关文件中,有一份冯骥才先生撰写的推荐材料。在这份名为《知情

同意证明》的材料中,冯先生写道:“我的祖祖辈辈一直把春节当作一年一度最重要、最期待、最美好的节日。中国农耕社会古老而漫长,人们生活和生产的节律依从大自然的规律与季候。春节处在旧的一年离去、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此时人们对新生活充满梦想与希望,故而创造出整套异彩纷呈、极具魅力的风俗和民俗,以贺新年。”

诚然,“春节”来自中国人对于日月星辰和四时物候的感知。在文字历法创立之前,华夏先民通过观察物候、天象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时间、指导农事活动,即所谓“观象授时”。而在古代天文历法中,确立“岁首”为重中之重。“岁首”顾名思义,是“一岁首月首日”的指

称,古称“元旦”,俗称“过年”或“中国年”。《中华遗产》杂志梳理说:“原始的丰收祭祀就是过年最早的起源。当稻谷收获后,人们自然欢天喜地,于是一边庆祝丰收,一边酬谢神灵的保佑,并祈求新一年的收获。”后来,何为岁首、何时过年,是由历法制度规定的。历史上,农历的十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十二月初一都曾被视为岁首。汉代以前,岁首之月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汉

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元旦”。

两套历法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最终,黔地乡贤、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将阳历1月1日命名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中国年”以“春节”的面貌出现。事实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元旦之后就进入了“过年”状态,我们不自觉地开始将公历换算成农历,在心中默数着春节的倒计时。正式的春节只有短短一天,但人们欢庆的状态和“过年”的心理感受则会一直持续到元宵节,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感觉和文化体验。

故而春节申遗成功,贵州人有一份特别的自豪,因为“春节”的命名者为籍贯贵州开阳的先贤朱

启钤。1914年1月26日,全体国民过了第一个名叫“春节”的“中国年”。算下来,“春节”至今刚好年满110周岁。

春节的时间跨度从农历腊月底直至转年的正月十五。其间各种习俗连绵不绝,从庙会、社火、戏剧、音乐、游艺,到年画、窗花、福字、春联、年夜饭等等,不胜枚举。《文史知识》杂志刊登了数千年沉淀的“春节习俗”称之为中国人最常用的“文化符号”。文章梳理了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七类:一是纪年动物。这是一套动物符号,把天象历法、农业岁时与人的生年结合在一起,以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以冠年,以春节关联人生;二是鞭炮。中国古老的四大发明有三种用在春节中,如造

纸、印刷术和火药;三是龙与狮。在世界各地华人社区中,舞龙与舞狮已成为中国春节文化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四是灯笼。春节中的最后一个大节“元宵节”,其标志性符号之一就是挂灯笼;五是红包。“红包”是新词,旧称“压岁钱”,是中国人“钱”的民俗;六是饺子与汤圆。这是春节饮食符号;七是故事。春节故事资源丰富,是春节口头传统的重要符号。

这些文化符号是春节大文化遗产的核心,它们在不同社会 and 不同历史时期构建了人与自然多元关系模式。正如春节申遗材料在阐述春节的意义和价值时所强调的:“过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延续性。这一项目体现了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多种社会习俗,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对家庭和国家的热爱。它还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

## ■ 博物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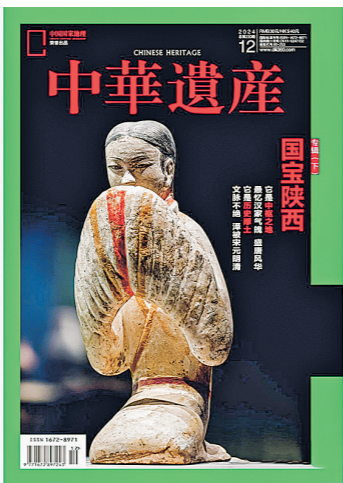
### 文物国宝里的陕西

《中华遗产》2024年12月号,月刊

国宝识中国,华章看陕西。陕西作为华夏历史上的中枢之地,可谓历史厚土,文脉不绝:陕西在远古即是华夏文明摇篮之地、文化奠基之地,又以其“汉家气魄、盛唐风华”泽被宋元明清。最新一期《中华遗产》月刊推出“国宝陕西”专辑,以陕西丰富的地下文物、百年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实证,深入发掘陕西对中国、对华夏民族的价值所在。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历史上,诸多王朝在此建都,尤其是周、秦、汉、唐。故而陕西遗址密集,在中国文博界有“地下文物看陕西”的名号。根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陕西共出土了7748750件可移动文物。此外,截至2020年12月31日,陕西省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49058处,而这一数字还在逐渐增加。其中,被永久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达36件。在迄今公布的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陕西共有270项。

这些文物国宝、文明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即迸发出璀璨的文明之光,纵贯了上下五千年。杂志主要介绍了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国第一个被发现和命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约6900年至4700年。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重要的一支,被视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陕西正是仰韶文化核心区。陕西境内仰韶文化的代表遗址,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高陵杨官寨等……先民的“智慧房屋”“宝贵物种”“创意陶器”,共同描绘出一片仰韶文化核心区的沃土景象。此外,位于陕西延安北郊的芦山遗址,出土了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中轴线对称式四合院建筑遗存,以及目前中国最早的瓦。地处陕西省神木市的石峁遗址,是迄今我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时期城址。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



对独立的城垣构成,防御体系戒备森严。城内密布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展现出了一个早期国家都邑应有的宏大规模。当然,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其陵墓也被认定在陕西黄陵县。这些有意思的考古细节,在日后均成为文明溯源的源头。

殷商时期,陕西也并非蛮荒一片,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发现了中国黄土丘陵区迄今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遗址,它就是被列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寨沟遗址。这里出土了目前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将中国双辕车历史提前了约1000年。到了西周,陕西作为周王朝的龙兴之地也出土了赫赫的文明遗存。“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论是祀还是戎,都离不开青铜器。杂志通过陕西出土的众多青铜礼器重新发现西周。尤其是作为“青铜器之乡”的宝鸡地区,出土了最早象征身份的鼎、簋,以及最早的西周编钟。钟馨与鼎簋一起,撑起了周礼中乐、礼的两极。

周室衰微,秦国迎来了属于它的时代机遇。一步步崛起,东拓,最终一统天下。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朝诞生了。秦朝以及随后的汉唐,也让陕西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 “会飞的F1赛车”隼

《博物》2024年12月号,月刊

人类天然仰望“更高更快更强”,动物界那些以速度见长的选手,也格外引人注目。鹰和隼,大概是我们较为熟悉的飞得快的两类鸟类。鹰翅膀短圆、尾羽宽大,适合在密林中灵活穿梭;更大的雕身大力猛,翅膀宽大,有着展翅翱翔的伟岸雄姿。而轻盈精干的隼,擅长在广阔的天空中追击、抓取猎物,主打一个续航长、速度快。最新一期《博物》期刊,着重介绍了“会飞的F1赛车”隼。

在传统的鸟类分类体系中,白天活动的猛禽会被归入“隼形目”,包括隼科、鹰科(各种鹰、鹞、鸢、雕、鸱)、美洲鸢科、蛇鹫科和鸮科。但后来发现,隼科与其他猛禽亲缘关系并不近,亲缘关系更接近雀形目(鸣禽)和鸮形目(鸮类)。于是在如今的分类里,鹰形目、美洲鸢目自立门户,隼形目反而只剩隼科一根独苗。

隼和鹰一样种类繁多,杂志主要介绍了四种较为常见的隼。其中,红隼是我国最常见的隼,分布范围极广,除了青藏高原、沙漠腹地,全国各处都能见到。红隼对栖息环境不太挑剔,会在旷野的土坡上筑巢,在开阔的荒地上巡飞,也会栖身于城市楼宇中安家。当我们走过街巷时,没准正有一只红隼站在高处注视着咱们。在绿化较好的市区,红隼靠着数量众多的斑鸠和麻雀,只需占据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领地,就能获得足够的食物。燕隼是一种长得像燕子的隼——燕隼翼形窄长,翼尖尖锐,飞在空中有点像燕子。燕隼的

寻常猎物是麻雀等小型雀鸟,以及蜻蜓、蝉等大型昆虫。号称“游击天王”的游隼,是隼类中飞得最快的,游隼俯冲捕猎时,身体仿佛导弹发射,速度甚至能达到386公里/小时,很少有猎物能够逃脱。游隼几乎遍布除南美洲外的全球六大洲,但在我国东部,通常只有在迁徙季节或冬季才能看到游隼。小个子红脚隼的主食,不是鸟类而是草原上的蝗虫、池塘边的蜻蜓、树上的金龟等等。有时在旷野中还能看到几十只红脚隼来回纷飞、抓捕昆虫,猛一看就像一群大号燕子。秋天迁徙时,红脚隼也不像多数猛禽那样千里独行,它们会结成数百只、上千只的大群向南迁徙。

杂志提到,欧亚大陆的隼类,几乎都是一副轻盈精干的空中猎手模样。但在鸟类物种迥异的中南美洲,有着特有的笑隼、林隼和巨隼等,极大地丰富了隼类的物种多样性。

## ■ 文史期刊

### 秦始皇的相貌与性格

《文史知识》2024年12月号,月刊

秦始皇的相貌如何?因为没有图像,也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目前还是一个谜。倘若有一天,秦始皇的陵墓被打开,尚可提取提取遗骨上的DNA,复原一个最接近真相的画像。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推测秦始皇的相貌,即通过“性格”倒推“面相”,其理论依据是“相由心生”。最新一期《文史知识》刊发文章作了尝试。

文章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则史料说起。一位叫做尉缭的游士,如是论说秦始皇:“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之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人。”意思是说,秦王这个人,鼻子长得像野蜂,眼睛很长,胸部如同老鹰般突起,声音如同豺狗般嘶鸣,刻薄寡恩而有虎狼之心,困处而有求于人时,不惜谦卑低首,得志而指使号令时,简直是要吃人。作者认为:“尉缭的这段话,是史书中直接叙述秦始皇生理心理特征的唯一一条材料,非常难得。两千年来,秦始皇的相貌性格,几乎由此而被定论。关于秦始皇人物形象的描绘,大致都由此生发扩展。”

但据作者考证,尉缭与秦始皇不是同时代人,两者几乎不可能有交集。那么,是谁在借尉缭之口评说秦始皇呢?作者认为,从内容上看,尉缭说秦王与范蠡说勾践如出一辙。首先,两者的结果相似:范蠡相面出后,判断其性格是“可与同患,难与处



安”;尉缭相面秦王政后,判断其性格是“居易易出人下,得志亦轻人”。结合上下文,深究其语义,都是说其人困处时能隐忍下士,得意时猜忌害人。最终的结论也相同,不可长久交往,以离去为好。其次,评说勾践与秦始皇面相的逻辑相似:勾践的面相,是“长颈鸟喙”,也就是脖子长,嘴巴尖而突出,属于鸟相,往往指鸟中的猛禽,鸷鸟如鹰类。在相面术中,这种猛禽相的人,当是一种类型,其性格判定为如同鹰鸷之忍人,即猜忌深且能隐忍的狠人。勾践,正是其典型。秦王政的面相也是猛禽相,与勾践属于同一类型。

综合以上理由,文章得出这样的结论:尉缭说秦王相貌性格,与范蠡说勾践相貌性格,都是古代相面术的运用。从二者的形式和内容相通类似来看,尉缭说秦王相貌性格的故事,应当是套用范蠡说勾践相貌性格的故事发展而来。至于这个故事的编造者是谁,在什么时候编造的?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暂时尚不能确定。

### 盘点古代奇葩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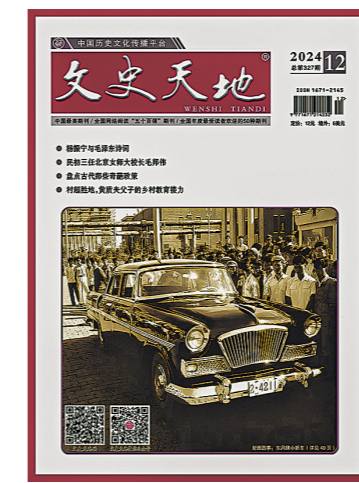
《文史天地》2024年12月号,月刊

古人谈治国理政,常提及“治大国若烹小鲜”,可见谨小慎微。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刊登文章,盘点了历史上那些另类甚至奇葩的政策。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综合性改革政策,其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在中国古代历次改革中显得十分突出。如此有作为的帝王,也出台了一项奇葩的政策:“魏诏守令劝课农事,部内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意思是,穷人家里没有牛,富人家如果有牛,富人应当把牛借给穷人,富人如果不遵这项政策,终身不得为官。这项政策的出发点自然是好的,如果能广泛推行且落实到位,自然是穷人的福音。但北魏也是一个贫富差距十分严重的王朝,至后期,百姓无法生存,纷纷逃亡,税收因此锐减,朝廷只得进一步加重赋税,如此恶性循环。

五代十国时南汉后主刘鋹制定了“想当官,先做宦官”的政策。刘鋹认为,群臣都有家室,出于人性会为“小家”而不顾朝廷这个“大家”,无法真正尽忠,所以他只信任没有后代的宦官。

一些基于“避讳”而出台的政策,也往往荒唐。唐朝皇帝姓李,“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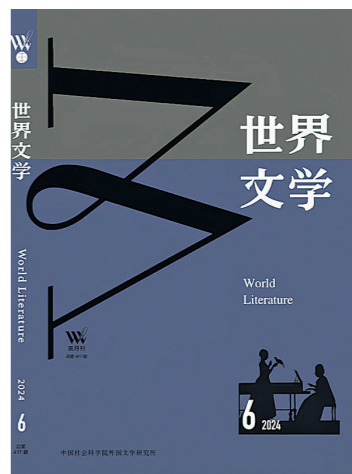


与“李”同音,所以鲤鱼在唐朝便成了一个特殊物种,身份较普通鱼类更为尊贵。朝廷下令,老百姓不得吃鲤鱼。那么,不小心捕到鲤鱼怎么办?只能放生。如果敢偷偷贩卖鲤鱼,一经发现,便要处以60杖的重刑。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朝代:宋徽宗赵佶属相是狗,所以禁止吃狗肉;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是鸡命,不仅禁吃鸡,而且下令在日常生活中谁都不许提“鸡”字,有违反者将被治罪;到了明代,皇帝姓朱,与“猪”谐音,于是提到“猪”字便有些敏感。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干脆下诏令,要求全国禁止养猪,正在养的猪也全部投入河中,结果,皇家祭祀时要用猪,也找不到一头。

## ■ 文学期刊

### “家”的文学

《世界文学》2024年第6期,双月刊



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出生、成长、成人,都有赖于家。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将会漂泊无依。在古代,人在家里出生,由家庭培养长大;病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有家人养老送终。简言之,生老病死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但在时代的变迁中,家中不论是经济的压力、理念的分歧、生活环境的变化、新技术的出现、成员的病故、新人的加入、权力关系的失衡,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导致家庭成员的情感隔阂、心理障碍、社会不适等问题。最新一期《世界文学》刊发了一组以家庭焦虑或变故为主题的当代短篇小说,帮助读者重新打量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背景下的家庭生活现场。

法国作家克萊尔·卡斯蒂的短篇小说集《对句》,收录了她的36篇小说。在《对句》中,作者以男女亲密关系为主线,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感受,向读者勾勒了一幅幅真实得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图景,以及涉及这种生活的各个阶段:恋爱、结婚、抚养子女、争吵、妥协、离婚、重组家庭。杂志从中选出了《他的前妻》《嫉妒》《让步》《指责》等8篇作品,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种种矛盾复杂的情感。

“沉默占据一个家,就很难再让它离开了;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不想让别人发现它。”在《闭门的家》中,西班牙作家赫玛·涅托以一套老破小公寓为叙述基点,让主人公的意识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逐步揭开原生家庭的真实面貌,以及他与父亲、过往、旧家逐渐和解的过程。小说原标题中的 casa 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既指抽象意义上的“家”,也指其具象载体“房子”。对主人公而言,家(房子)是庇护,是栖居之所,也是牢笼,是不能说的秘密。闭门的状态隐喻了家庭成员之间情感沟通无能的困境,或许唯有爱能逾越这道沉默的鸿沟。

巴西作家马萨尔·阿基诺的小说《家宴》以一家人的餐馆聚会为场景,展现了潜藏在家庭内部多重危机的危机。另一位巴西作家迪奥戈·阿尔梅达借由《聊天机器人》来展现电子媒介对于当代家庭关系构成的威胁,揭示了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由“消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格局。

美国作家约翰·列依的两篇小说《蓝光,红光》和《门》主要讲述人的执念(如保护欲、控制欲)因何产生,又如何在家宅内引发灾祸或纷争。列依的叙述具象化了这种执念的虚妄。

尼日利亚作家奇卡·乌尼格微的小说《成为普萝丝佩勒斯》将我们带入欧洲移民家庭的生活空间,观察女性移民在巨大的生活落差中所经受的心理和情感危机。